

落木萧萧思先君

· 孔祥瑛 ·



孔繁爵先生遗像

家父讳繁爵字云生，一八八五年九月五日（光绪十一年乙酉七月二十七日）出生于滕县东龙岗村贫苦家庭。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歿于山西省平遥县，终年八十四岁。今年正值诞生百年祭辰。天寒岁暮，落木萧萧，缅怀音容，哀思曷已。

家父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及历次运动，生平事迹非仅是个人际遇，也是我国近代史长河中之一粟。

爰书此文以应我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之约，非仅寄陟岵之思也。

一九八五年秋于北京。

一、苦难童年·少年自励·从军救国

我父亲出生的时代，正如中山先生所说，是“庸奴误国，荼毒苍生，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的时代。十九世纪末页，经过鸦片战争之后，订立多种不平等条约，各帝国主义者踢开了昏聩清廷闭关自守的大门，用强权划分势力范围，以图瓜分中国。我国人民生活在黑暗、贫穷、苛捐、外债，重重灾难之中。父亲出生在东龙岗村的贫苦农家。沉重的剥削、微薄的收成、顽固的封建陋习（出嫁姑娘要极丰厚的妆奁，家里接连陪嫁了两代的姑奶奶），使一家数口终年不得温饱，常时炊尽粮绝，只能煮芋头秧子汤喝。记得父亲曾对我们说，芋头叶子、秧子上有细细的毛刺，喝到肚里“抓闹”得难受，那汤实在难以下咽。我的祖母脾气倔犟，虽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谆谆教导父亲说：“冻死迎风站，饿死打嗝嚔！”表现出山东劳动妇女勤苦耐劳坚强的性格。

甲午战后，中国割地赔款，满清政府大举外债，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在一八九五——一八九九年间，更加上水、旱、虫、雹等自然灾害遍及全国，其中山东受灾面积最大；一八九九年黄河决口，山东淹死十六万人。龙岗受到蝗灾，记得父亲说过，蝗虫（即蚂蚱）飞来象漫天乌云，落到地里一片沙沙声，把庄稼吃得精光，老乡们只有哭天抢地，毫无办法。正在这灾荒

年月，祖父病逝。原已无衣无食，埋葬了祖父，更是债台高筑。对父亲来说，童年并没有欢愉，人生旅途的开始就这般艰辛。祖母决心让父亲外出谋生，对父亲说：“走吧，到外边找个活路。”祖母整治了一些粗茶淡饭，请来了四邻八舍的乡亲们。父亲感谢大家的帮助，说：“父债子还，只要我孔繁霖在，今天受到叔叔大爷们的恩典，将来一定报还。”当时秦忠鑫老大爷带头把借据烧了，说：“大兄弟，这点儿债就算了，你尽管放心出门，只要俺家有“糊涂”（是老家的一种饮食，类似稀粥，多是用高粱等面煮的）喝，就不能饿着老嫂子（指我祖母）。”我父亲双膝下跪，对乡亲们一一磕头。隔了几日，父亲和祖母抱头痛哭，辞别了生长养育的故乡，家里留下一个病弱的弟弟和两个陪嫁出去而遇人不淑又回住娘家的姐姐。一九三四年寒假，父亲对我说起这段往事还禁不住涕泪纵横，既感恩于乡亲们深厚的爱护之情，又感伤于当年生活的辛酸。

山东人走投无路就离乡背井闯关东，父亲没有到关东，却到了山西大同，投奔一位作镇台的族叔。一个乡下穷孩子找到大官衙门，遭受种种冷遇和奚落，自不必说了。大同在雁门关外，风劲地寒，十冬腊月衣破衾单，冻得夜不成眠，以致于落下终身不治的寒腿病。父亲记得祖母的教诲，人穷志不能短，活就要活得硬气，强忍着百般屈辱，但要谋自立之路。在衙门里看到族兄弟少爷们入塾读书，很是羡慕，决心自学，刻苦勤奋，努力摄取知识。东龙岗是穷乡僻壤，生活贫困，耳目闭塞；大同是当时晋北

重镇，父亲在那里才知道了什么甲午之战、戊戌变法等等，又由耳闻目睹，逐渐认识到满清政府的昏庸、民穷国弱、列强宰割的现实。可以说，投奔到大同是父亲一生的转折点。

父亲激于单纯的爱国心，以为弱国图强要有武备，以军救国，自己要从军。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山西筹设武备学堂，为培养下级军官，父亲考取入学，时年十七岁。一九〇四年毕业，清政府决定选派大批青年学生留日，分配给山西五十人的考选名额，其中武备学堂有二十名，父亲考选录取，得到山西的公费，保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陆军，受中、高级军事培育。一九〇四年七月，由武备学堂职员吴春康带领赴日，同去的有温寿泉、闫锡山、马开禧、乔煦、黄国梁、井介福、荣炳、张呈祥、荣福桐、李大魁、张瑜、焦纯礼、金善宝、金凤巢等。

因此，父亲祖籍山东，却和山西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

光复太原·燕晋联军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页，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各地建立新式学堂，兴起留学运动，特别是受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富强的影响，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涌向日本，形成了留学日本的高潮。据统计在一九〇六年左右，中国的留日学生达八千人之多。父亲到日本去正是这个时期。

在民族危机深重，反动的满清政府彻底卖国投降的情况下，留日学生积极参加爱国运动，组织爱国团体，出版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在宣传民主思想最有力的有陈天华、章炳麟、邹容等人。我父亲当时受他们的影响，接受了反帝、反满、爱国救民的民主革命思想。

一九〇五年七月，孙中山先生从欧洲到达日本，受到留学生和各革命团体的热烈欢迎。七月下旬，由中山先生提议召开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织的联合会，讨论成立“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问题。八月二十日，同盟会在东京举行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同盟会总章和宣言，推选中山先生为总理，黄兴等人分别主持各部工作。同盟会的成立，把分散的革命团体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力量以领导革命斗争，这是符合于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的。当时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除甘肃省无人外，内地十七省都有代表参加。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光绪三十一年乙巳），父亲加入同盟会，由张继主盟^①，是早期的盟员，属于山西分会。自同盟会成立到一九〇七年前后，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斗争很激烈，父亲坚决拥护中山先生的主张——革命、民主、平均地权、反对保皇，反对“开明专制”和封建土地制。这一时期，父亲积极追随中山先生参加革命活动。

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一批毕业生，由清廷陆军部召回国，在北京举行考试后，父亲和温寿泉、闫锡山、马开禧、黄国梁等人都会被派回山西为新军骨干。当时

山西的旧军制已改编为新军，革命人士在新军中的实力日渐增强。

辛亥年（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革命党人大受鼓舞。陕西革命党人于十月二十二日（农历九月初一日）在西安起义，光复了陕西全省。山西的形势紧迫，一方面是清廷抚台陆钟琦严加防范，一方面是革命党人积极部署。十月末，我父亲和温寿泉、黄国梁、闫锡山、赵戴文、南桂馨、乔煦等人连日密商（当时黄国梁是清军八十五标标统，军队分驻新南门外狄村、岗山村一带。闫锡山是八十六标标统，他早已和太原的清廷大衙门和立宪派咨议局头子梁善济等人有拉拢，当时心怀观望）。十月二十九日（农历九月初八）清晨，黄部姚以价（音介jiè）率军发难，起义军由新南门冲入城内（辛亥革命后新南门即命名为首义门），占领子弹库、军装库、藩库，攻入抚台衙门，击毙陆抚台，太原城守尉增禧（满人）树起白旗缴械投降，顺利地推翻满清政权，太原光复成功。参加起义的各主要人员，当天在省咨议局集合开会，决定成立山西军政府，由闫的帮伙控制会场，闫锡山攫取为都督，温寿泉为副都督，黄国梁为参谋部部长，父亲是参谋部副部长。翌年成立督军府，父亲改任参谋司司长，掌管军队教育与作战计划事宜。

光复战役中，一部分军官带头抢了藩库的存银，各处兵士趁机抢掠，闹市富商区的羊市街、柳巷、帽儿巷、估衣街等地被抢劫杀烧，火光烛天，全城大乱。父亲参加巡逻弹压，他对这种

骇人的景象很是困惑。几经弹压，秩序稍定，但藩库既被抢劫，军费无着，暂发军用券以维持，而军用券不能兑现，军心不稳。当时太谷县、祁县有几家著名开银号的大财东，父亲被派到太谷另有人被派到祁县去借饷，共借到白银数十万两，收兑军用券，军心大定。父亲认为应言而有信，既是借就应还，以后送还时，大财东们说革命是义举，他们愿捐饷赞助，不肯收纳，这笔钱财闫锡山就用作大汉银行的资本了。父亲在太谷老财主家第一次见到用贵重的田黄石（价同黄金）当砖头块垫床腿，也不免引起震惊，他实在意想不到剥削生活竟能奢侈到这般地步。

山西继武昌、西安之后起义，清廷因近在肘腋大为惊恐，极思镇压。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四日（农历九月十四日）急调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带兵入晋。吴禄贞字绶卿，湖北云梦人，一八九九年肄业于东京日本士官学校与黄兴共同创立兴华会，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者之一。当时他是北洋第六镇统制（相当于师），六镇是在袁世凯小站练兵的基础上扩建的，吴禄贞以延吉筹边有功膺此重任②，但小站之徒阴谋掣肘。十一月四日吴禄贞到石家庄，密派参谋何燧到娘子关，与山西起义军司令官姚以价联系。十一月五日与闫锡山在娘子关正太车站会见，共商北方革命大计，决定组织“燕晋联军”，推吴禄贞为大都督兼总司令，闫锡山为副都督兼副司令，共同出兵回师北京。欢谈至晚各回防地。当晚午夜，吴禄贞不幸被自己的卫队长马惠田击杀于办公室（时年三十

二岁)。马蕙田受袁世凯收买，并将吴的头颅割去向袁世凯请功。

我父亲由太原到娘子关参加了这次会见。当时闫锡山满腹狐疑，到正太车站之前先对驻军做了埋伏和安排，而吴禄贞不带一兵一卒坦然前来，对闫说：“我是来同你一起革命的，不是来作巡抚的。”吴侃侃而谈，分析形势说：“袁世凯是有阴谋的，也是中国最大的毒瘤，此贼不除后患无穷。我们和滦州张绍曾、山东靳云鹏约定日期，要先一步赶到北京，袁世凯的计划就完全破产。”吴禄贞比我父亲长五岁，父亲对他的坦荡气度、卓越才识很是敬佩，对他的被害深为哀悼。一九一二年三月四日临时大总统孙文签发“奖恤吴禄贞等令”，吴之死使燕晋联军未及成立而失败，实是很大损失。

袁世凯于十一月十三日（农历九月二十三日）即由湖北回京，操纵满清政府，竭力镇压革命。清兵进攻山西，破娘子关迫太原。闫锡山要放弃太原，赵戴文赞同；温寿泉反对，力主闫不要离开太原，以免动摇军心，我父亲赞同。结果闫锡山带着赵戴文于十二月十二日化装北逃，后来栖身于包头。温寿泉和我父亲坐镇太原，以后温寿泉也带了一些人到晋南活动，我父亲留驻太原，在极困难的情况下斡旋应付，直到一九一二年四月，闫锡山才从忻州返回太原。

三、和闫锡山的齟齬

在日本时闫锡山伪装进步并不暴露他的本性，使人很难了解他。父亲只觉得对比之下，温寿泉为人宽厚诚恳，有见识，有学业专长，值得敬重，因而和他缔金兰之交，结为换帖弟兄。

回到山西，在太原光复的前后，闫锡山逐渐显露出他要两面派的手腕，一面以革命派自居聚集同盟会的势力，一面又与山西立宪派梁善济、清廷官僚姚锡光、谷如墉等勾结。及到娘子关与吴禄贞晤谈，相形之下，吴禄贞坦然磊落，而闫锡山狡诈叵测，父亲逐渐对他有了看法。燕晋联军失败，娘子关吃紧，父亲认为要顾全革命大局，固守起义据点，不应离弃，而闫锡山却化了装骑着小毛驴急匆匆地跑了。这是父亲和闫锡山最初的意见分歧。

一九一二年九月十八日，孙中山先生到达太原，十九日参加群众欢迎大会，二十日在参谋司举行山西军界欢迎会，当时父亲是参谋司司长，主持接待。中山先生视察了山西的铁路、矿藏等；观察了闫锡山的人品后评论说：“吾行南北，见起义将领无如闫之庸鄙者，非特庸鄙也，其人实龌龊，曷足以语革命！”足见中山先生识人之睿智。

闫锡山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投靠袁世凯，并将自己的父亲作为人质长住北京，以示忠心。一九一三年袁就任正式大总统后积极筹划当皇帝。父亲劝诫闫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帝，

现在你又拥戴袁世凯当皇帝，革命不是白革了么？不能做这种违反历史潮流违反革命的事。”闫锡山不听，反而和北洋军阀一起通电辱骂黄兴、胡汉民等。“洪宪”短命，闫又投靠段祺瑞。

一九一七年，山西军队扩编为四个旅，父亲是第三混成旅少将旅长，其它三人是商震、马开崧和赵戴文。这年七月张勋带领“辫子兵”到北京准备复辟，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南方各省纷纷声讨，父亲力主响应，被任命为讨伐张勋的指挥官，带领军队由太原经石家庄进驻长辛店，先头部队到达宣武门外。七月十二日张勋逃到荷兰使馆，复辟丑剧结束，父亲率兵返回太原。

张勋复辟失败，北京政权完全由北洋军阀冯国璋、段祺瑞掌握。段祺瑞不恢复国会而且废弃“临时约法”^③。中山先生号召护法，反对段的伪共和，西南的唐继尧等拥护中山先生的主张，起兵反段，称为“护法运动”。段祺瑞电令闫锡山出兵。父亲极力劝阻说，中山先生是同盟会领袖，领导了辛亥革命，所签署的“临时约法”是为了给人民以民主。现在却要依附于段祺瑞通缉中山先生，“征讨”护法运动，实在是背叛了革命；不可积极参与，应予拖延缓冲。闫锡山不听，派第一混成旅旅长商震带领军队并带炮兵营周耿到湖南参加“征讨护法运动”，结果在湘潭全军覆没被缴了械。

一九三一年山西省银行钞票剧烈贬值，由于闫锡山搜刮民财扩充军备，大量印发钞票不能兑现。当时父亲和一些人士极力建议早日定价回收省钞，免得老百姓受坑害太苦。闫锡山却别有打

算，不予采纳，直到票子跌到最低价值时，他另发新票，以一比二十收兑旧票，使许多商号和家庭顷刻破产。人们拥挤在山西省银行门前，哭喊叫骂，有焚烧旧票子的，有自杀的，人民无限愤慨。

一九三二年，闫锡山计划修筑同蒲铁路，北起大同南抵风陵渡，全长约八百五十余公里。为了保卫土皇帝的宝座和实力，闫要把铁路修成窄轨。父亲主张应修成标准轨，有利于开发山西的物资和加强国内运输线的联系，这正触犯了闫锡山不可告人的心病。所以闫锡山把同蒲路的修筑计划、工程指导等都由他自己的绥靖公署直接掌握，而为了箝制父亲的发言权，却封给一个“同蒲路筑路督办”的空头衔，用他的外甥张某为襄办领着实权。后来，张某以枕木贪污案发，有些朋友为父亲担心，劝他到外地避避风，父亲自知清白，心中坦然不为所动；筑路工程中有许多人和这贪污案有牵连，父亲丝毫无染。

由于多次的意见分歧，必然是齟齬隔阂，貌不合而神也离。依父亲直言不讳的脾气，又不会曲意奉承，闫锡山和他的帮伙自然心中不满，但是因为父亲是太原光复的主要军事人员之一，更因为父亲为人耿介，清廉自持，抓不到什么把柄，无可借口，不便惩处，局面维持下来；但是父亲的处境显然是相当困难了。

四、寄 人 篱 下

闫锡山帮伙是极端排外的，而父亲却是以外省人寄居山西。

当年太原光复起义的主力是新军八十五标，标统为黄国梁，起义成功在省咨议局聚议时，有部分同志推选黄国梁作都督，闫帮伙立刻反对说：“黄国梁是外省人（陕西），不行！”他们不仅毫不掩饰地排外，而且铲除异己极端阴狠凶残，不择手段，对山西各地起义的志士横加逼迫残害。比如，夺取首义门的八十五标二营营长姚以价，被迫远走他乡；大同起义的革命同志被迫害只留下一个宋世杰为骑兵营长，最后闫锡山还是假手他的镇北镇守使张汉杰把宋残杀在小校场。

一九一二年九月十八日中山先生到太原，一再发表演说，极力号召团结奋斗，不谋私利，建设国家。并且明确提出山西应当注意实业，开发矿藏，修筑铁路，可考虑仿行西法，利用外国资本等。这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给人以鼓舞。父亲满怀热情和理想，认为既然革命成功，就可以根据中山先生的倡导，致力建设。山西得天独厚，有极丰富的矿产资源，又有特殊的地理条件，可逐步实现“三民主义”。但是，在闫锡山把山西做为自已搜刮统治的地盘的威慑下，父亲的“理想”只不过是一场梦幻。

一九二四年九月直（吴佩孚）奉（张作霖）开战，闫锡山先

表中立，从旁观望，到十一月间，伺机以图得渔人之利，立刻出兵。父亲被派为总指挥，带四个旅约七千人开赴石家庄。接着闫锡山又改派他的镇南镇守使张培梅，以左翼军总司令名义到石家庄指挥。张声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借军法将父亲手下的两个旅长刘树藩、龚凤山砍头，并悬首营门示众，杀气腾腾，使我父亲岌岌可危，随时都有不测或致丧命刀下；使父亲当时深切感到外乡人寄人篱下的绝境。

父亲是职业军人，他历任少将旅长、中将师长和军长。在日本士官学校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他认为“军人就是服从”、“下级服从上级”，因此他只能服从、接受任务，而不得不斡旋于你争我夺的军阀之间。但是他本着爱护人民的赤子之情，愿在出生入死中尽自己的一分力。

一九二七年六月，闫锡山悬挂青天白日旗后，虚于应付送走了张作霖派来谈联合的代表，九月即部署军队袭击奉军。当时张作霖是“安国大元帅”驻军北京。在京汉、京绥两线上出击的各路大军都相继失利：商震占领宣化又退回大同；中路警卫团出龙泉关到达唐县损失惨重撤回山西；原拟在保定北京之间截断铁路而直取北京的傅作义，于十月中占领涿州，因联络中断苦守三月后，到一九二八年一月中为奉军改编。闫锡山是在这种情况下和蒋介石联合作战的，即所谓国民党革命军北伐。一九二八年三月，“总司令”蒋介石指令各集团军（蒋、冯玉祥、闫、李宗仁）共同“讨奉”，令闫军沿京绥、京汉以西地区前进，各集团军会师京

津。闫锡山和蒋介石都想利用我父亲和张汉卿(学良)的交谊,说动张作霖撤出北京。蒋介石接连发来几封急电。父亲再三思量,从个人来说,此事成败难卜,如若不成功,可能身首异处;从大局和人民来说,如若功成,可化干戈为玉帛,使北京古都免毁于战火,保护北京上百万人民保全身家性命,自己虽付出生命也在所不辞。五月底,父亲先到南京再到上海,化名马先生乘船北上,随行副官王镇典一人。行踪虽慎密,但到天津一下船,奉军已派人等候迎接。抵京后住鲍家街鲍宅④,即和张氏父子昼夜磋谈。最后,张作霖接受了我父亲的劝说,六月四日彻夜鸡犬不惊,奉军全部撤走,张作霖也于清晨乘京奉线火车出山海关。北京人民一夜安眠,天明开门上街,大兵们都不见了,实出意外,无不额首相庆,免却了一场毁灭性的兵灾。当然奉军的撤退也有其历史条件,但我父亲来说,他认为冒着万分危险,出入于刀枪斧钺之下,能保护了北京和人民,是个人生平为人民做的第一大好事,确实从心底感到欣慰。

奉军既退,各路大军争夺京津,闫军急行挺进于六月八日进占北京。这时闫锡山的势力已扩展到晋、冀、察、绥四省及京、津两市,要和蒋介石平分秋色了。“北伐胜利”,蒋、闫的统治代替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总之,我父亲既没有“政客”的野心,更没有“政客”覆手云雨的伎俩,而被驱遣利用奔走于军阀们混战的角鹿场,这实是有违初衷的。他回想当年满腔热血追随中山先生闹革命,推翻满清建立民国,而革命到目前也并没有什么“民主、民权”,皇帝换

成了军阀；新军阀又代替了旧军阀；更没有什么“民生”，老百姓依然沉沦于不可聊生的深渊！回想当年一同抛头颅起义的同志们，而今已大多消慵，沉缅于捞钱盖公馆、捧戏子、吃喝嫖赌、强占良田营造花园别墅。岁月流逝仅不过十几年啊。回想当年自己风华正茂，也有一番“大梦谁先觉”的抱负，而今寄人篱下，爱国之心未得抒发，为国为民无所奉献，实有愧于初衷！

父亲既没有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更没有阶级斗争的理论思想，必然不理解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必然不能正确地认识过去、分析现实、展望未来。他只见到在中国大地上由于腐败的政治、纷争的战火所掀腾的浊浪和无尽的黑暗与灾难，看不到前途，而徜徉于我国历史车轮颠簸前进的坎坷旅途，困惑于那复杂、纷扰、重重矛盾之中。

这是个人的苦闷？时代的症结？历史发展的必然？

五、矢志办学

由于幼年失学，虽然刻苦自励以及东渡留学，但父亲总觉得自己对祖国的文化没有丰实的系统的学习，深以为憾。少年时请别人画扇面说“牧马桃林”，后来知道说错了（应是归马华山、放牛桃林）^⑤，徒惹故作风雅之讥，终身引以为耻。所以生活稍得安定就买书读书，平生也最爱书，凡商务、中华以及各书局出版的国学历史舆地等著作，必定预约购置，以后又收集善本、碑帖

以及宋元以来画卷册页扇面，七·七事变我们弃家南逃，悉遭日寇焚掠一空。父亲对学者是很敬重的，曾邀请我县颜兰亭先生到太原讲学并奉赠《皇清经解》等；对山西大学的名教授郭象升（字可稽，文章家），李亮工（文字学家，曾从章太炎先生学“小学”），执礼恭谨。三十年代初卸职家居，和名士柯璜、湖南学者周震麟、书画家北京傅心畲及四川张善孖、张大千昆仲，过从密切，谈文史论书画，酬酢聚叙以为乐事。

在家庭教育方面，对儿子女儿平等对待，一样受教育，同时管教严肃，我家不随听戏、宴饮、打牌、串门时尚，我们在寒暑假中也另安排功课，父亲日日检查，背诵、书写不用心必受责罚。我们的学习条件百倍于父亲少年时代，自应珍惜努力。

父亲感受最深的是在日本，他看到明治维新以后，不仅武备强悍，生产发达，且对教育事业也有很多建树。明治政府实行资产阶级改革的重大政策之一是“文明开化”，广义地说是包括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思想风尚和生活方式等在内的资产阶级社会启蒙运动；狭义地说，主要是指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近代化和普及。当时办教育以小学为基础，进而普及国民教育，以期作到“邑无不学之户，户无不学之人”。明确实施近代教育的目的是：“国之所以富强安康，无不缘于世间文明人才艺之巨大发展，而文明之为文明者，实有赖于一般人民之文明”。在二十世纪十年代末，日本小学教育日益普及，就学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强，同时改进充实中高等教育，振兴实业教育，造就科技骨干

力量。父亲认识到教育是建设国家的基础。对比自己的家乡——贫穷、愚昧、无知，他感到痛心。

父亲决心办学，要让乡亲们的子弟有机会念书学文化，不要再象自己的幼年。父亲说：“过去的学校都是为有钱的人办的，穷人家的孩子上不起，我主张把学校办到农村去，让乡亲的孩子端着糊涂，拿着煎饼来上学。”直到一九二六年前后，父亲才有能力办学，创办了“龙岗小学”（当时滕县级索区还根本没有学校）。开始时只有两个班，到一九二九年添建两排校舍，增至四个班。来就读的学童除龙岗本村的，远及级索、西湖边的村镇，学生最多时有二百余名。学校经费每月约需三百元，除县上小额补助外，全由父亲独力负担。小学的第一任校长是王乾四，翌年由孔繁达继任。教师有刁可诚（字墨泉）、陈慕唐各位先生。父亲认为学校要办好，要有好教师，要为教师提高教学创造条件。学生要学习，教师更要学习，图书设备很重要。所以，父亲为小学购买了《万有文库》、《小学生文库》、《幼童文库》、《纲鉴》、《康熙字典》以及各种图书、教学挂图、历代法帖拓片等。务使教师备课有参考，学习有资料，学生课外有读物。为聘请优秀教师，购买教学设备，不惜代价。以后学校发展，校舍扩充到三十余间，除教室以外，有办公室、宿舍、餐室、图书室、游艺室等。鼎盛时期，四方学生前来就读，有四百余人。毕业的学生有王德溥、孔繁迈、陈培美（字仲甫）、陈正人（字静波）、李玉森等。抗战期间滕县沦陷龙岗小学停办。据闻现在已于原校址恢